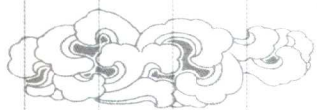


旷世大儒——荀况

郭志坤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旷世大儒——荀况

郭志坤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世大儒——荀况/郭志坤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1

(旷世大儒)

ISBN 7-202-02815-8

I. 1. 旷… II. 郭… III. 荀况-传记 (约前 313—前 238)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331 号

丛 书 题	旷世大儒
书 名	旷世大儒——荀况
作 者	郭志坤 著
责任编辑	李大星
美术编辑	马少华
封面设计	李颖明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57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202-02815-8/K·688
定 价	17.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在 2000 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 2000 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利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有说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

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大时代的产儿	[1]
一、童年岁月	[1]
二、姓氏与王家血脉	[3]
第二章 稷下游学	[8]
一、东行游学	[8]
二、“学始乎诵经”	[11]
三、《诗》的征引	[19]
第三章 追寻先王之道	[27]
一、开掘《书》之要旨	[27]
二、不作“末世穷年”的“陋儒”	[31]
第四章 “最为老师”	[38]
一、稷下学官——“祭酒”	[38]
二、稷下的传统和荀子的治学	[40]
三、师承关系	[45]
第五章 综百家之学	[51]
一、解诸子之蔽	[51]
二、批判中的吸收	[58]
三、相灭相生归融合	[63]
第六章 西去秦都	[69]
一、“隆礼”与“重法”	[69]

二、立法同	[76]
三、“令行禁止,王者事”	[80]
第七章 “山林川谷美”的秦国	[85]
一、追求富利乃人间正道	[85]
二、富民与兴邦同义	[88]
三、在富足中养成礼义精神	[91]
第八章 “益地不如益信之务”	[96]
一、当务之急在于“益信”	[96]
二、人人都应守信	[101]
三、强盛的根基在于“隆信”	[103]
第九章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108]
一、禁暴除害和选拔将领	[108]
二、“以德兼人”	[112]
三、治军要旨在于“壹民”、“同力”	[117]
第十章 再作“祭酒”	[123]
一、“化性起伪”和“解蔽”	[123]
二、德育和智育并重	[128]
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131]
四、“国将兴,必贵师”	[135]
第十一章 寓教于乐	[139]
一、“教娱统一”	[139]
二、“美善同一”	[144]
三、“中和之美”	[149]
第十二章 “谈说之术”	[154]
一、既简且明的“谈说之术”	[154]
二、入情入理的修辞手法	[159]

三、三言两语的寓言特色	[165]
第十三章 “行”高于“知”	[170]
一、学而后知	[170]
二、“行”高于“知”	[174]
三、行难知也难	[177]
四、“知有所合”	[181]
第十四章 “形具而神生”	[186]
一、“心”为身体之主宰	[186]
二、“情”为性所生	[192]
三、“心生而有知”	[197]
第十五章 “制天命而用之”	[204]
一、“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204]
二、寓政治哲理于自然知识之 中	[210]
三、“气”为万物本源	[215]
第十六章 至诚化民	[221]
一、教化一生	[221]
二、“治国之征”	[224]
三、“至诚”能化万民	[229]
四、宣教与处罚并用	[233]
五、“善假于物”，配以乐教	[236]
第十七章 兰陵令	[241]
一、集诸家之长	[241]
二、人“最为天下贵”	[246]
三、人之性恶	[251]
第十八章 修身以自强	[257]
一、伦理道德的“源”与“功”	[257]

二、礼为诸德之纲	[262]
三、“义利两有”	[267]
四、修身三法:学思行	[271]
第十九章 寄情于“一天下”	[276]
一、“齐一天下”乃民心所向	[276]
二、统一天下“应以德兼人”	[282]
三、“天下将归于一”之预见	[287]
第二十章 着眼于“法后王”	[292]
一、“变”为天地之道	[292]
二、“积微”、“积靡”的量变与 质变	[296]
三、“法后王”的发展观	[299]
第二十一章 荀子与荀学	[305]
一、学儒而背儒	[305]
二、“名实相符”	[307]
三、地位和影响	[314]
第二十二章 历代对荀子以及荀学 的评论	[322]
一、汉唐:奉为圣人	[322]
二、宋明:打入冷宫	[327]
三、清朝及近代:重被尊奉	[330]
附录一 荀子生平年表	[336]
附录二 参考书目	[340]

第一章 大时代的产儿

战国时代，的确是一个大时代。一个征战不绝、烽火连天的大时代，一个风起云涌、变革迭起的大时代，一个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大时代。就在这个大时代走向它的尾末的时候，在三晋之地的赵国的沃土肥田中，孕育出了一个出色的大人物——荀子。由于他的出现和存在，使百家争鸣的局面更增添了熠熠光彩。

一、童年岁月

对于荀子的生平，史书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史记》为之作的列传，也只花了短短的二百来字，粗线条地勾勒了这个伟大时代骄子的生平事迹。

“荀卿，赵人，年五十（按：系十五之误）始来游学于齐。”只有十二个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荀子是赵国人，在十五岁之前，他是在赵国度过的。

从现有资料提供的线索可知，荀子的出生年代约于公元前315年。

有了时间流程的坐标，有了生存空间的方位，我们借助于某些史料，就可以约略推知彼时彼地的历史境况了。

其时，战争还在继续，战火还在蔓延，但统一的曙光却已透

露出了某些信息。从“无义战”的春秋初叶，到荀子出生之时，仗已经打了四个半世纪，也就是说，差不多十几代人都是在战争环境中生存过来的。人民厌倦了，人民厌倦战争。但是，虽然战事频频不断，社会还是在发展，在前进。从大小数百诸侯间的攻战，到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这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到了战国后期，即荀子生活的那个年代，“七雄”中真正能雄视天下的也只有三个国家了，即所谓秦、齐、赵三强鼎立，秦齐并称西、东帝，而赵国强劲地据于其中，在此过程，列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也都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

就在荀子呱呱堕地之时，儒家的传人孟子已经名声颇大。他当上了齐国的卿相，劝说齐宣王要行“仁政”，不然不但天下不能由齐来统一，相反，齐会被人家统一掉。孟子在答新立的魏襄王问时，先声夺人地道出了一句石破惊天之语：“天下将定于—！”“定于一”就是走向统一。这种“定于一”的思想，不能不对荀子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后来，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以下凡引用《荀子》，只注篇名），可以看成是孟子“定于一”的翻版。

在荀子出生数年后，赵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赵武灵王宣布“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当时对这件事的阻碍很大，除少数官僚同意这样干之外，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高官都反对。当时反对最为激烈的有三个人：公子成、赵造、赵文。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坚决驳斥了这些谬论，指出“理世不必一道，国不必法古”，公然宣布：“吾无顾天下之义矣！”于是，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训练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等等。这样一来，赵国

大大强盛起来了，成为真正可与秦国匹敌的强国。

这场改革应当说不只限于军事，更深刻的影响在于人的思想和文化。赵武灵王说：“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史记·赵世家》）这位赵王讲的并不止是军事，“儒者一师而俗异”——荀子与孟子同师于孔子，可荀子敢于“俗异”，敢于提出自己的学说，也是受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影响和启示。

赵国是一个文化水准较高的国家，不然，就出不了赫赫有名的平原君。而平原君之封，恰在荀子童幼之时。公元前298年，赵惠文王元年，以弟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当时，荀子当为十来岁。而赵胜之“喜宾客”，搜罗“文武备具者”，当在此之前已开始。据历史记载，由于平原君之好士，“士不远千里而至”，“宾客盖至数千人”，当时的一些文化和学术大家，如公孙龙、邹衍之属，纷至沓来。晚年，平原君“上采《春秋》，下观近世”，著《虞氏春秋》。这些，都会对年少时的荀子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可以说，在魏，在楚，在齐，在宋，各有学者荟萃之地，而又以赵为甚。平原君的好士，赵武灵王的开阔胸襟，使童年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荀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气质和秉赋。

二、姓氏与王家血脉

由于年代久远，史籍阙如，先秦时代的诸子多有连姓氏都争议不一的。比如墨子，有人说是姓墨，有人说不是，认为“墨”“只是其人外部表征的反映，而其姓该是‘翟’”。同样，对荀子的姓氏历来也多所争论。本书将诸说和盘托出，并略陈己见。

荀孙之别。荀卿，又称孙卿，古籍中对荀子的称谓不一。

《荀子》中的《儒效》、《议兵》、《强兵》、《尧问》等篇称“孙卿”；《韩非子·难三》、《战国策·楚策》、《韩诗外传》、《刘向叙录》、《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盐铁论·毁学》、《风俗通义·穷通》等篇又时而称“孙卿”，时而称“孙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李斯列传》以及《史记·春申君列传》又称“荀卿”或“荀卿子”。对此不一的称谓，历代学者均有解释。可见，荀、孙相通，荀子又称孙卿，似为古籍所认可。

避讳之说。司马贞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下作了索隐，说：“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孙卿”下作注说：“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司马贞、颜师古皆称避宣帝名询而更改的。后人对此作了许多考证，认为汉代并无避讳名之例。谢塘说：“荀卿又称孙卿，自司马贞、颜师古以来，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故改荀为孙。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书本字。诎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改称之？若然则《左传》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汉书》任敖、公孙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骜也。”（《荀子笺释》序，见《荀子集解》考证上）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音通假说。谢塘认为所谓“避汉宣帝讳”不能成立，那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他又作进一步的解释：“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曰胜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比。”（同上）顾炎武也说：“荀为孙，如孟卯之为芒卯，司徒之为申徒，语音之转也。”（《日知录·汉书注》）有的说，荀之为孙，犹如《论语》中“恂恂如也”改作“逊逊如也”。刘师培在《荀子

补释》中指出：“《史记》作荀，本书作孙，是犹处子作剧子，环渊亦作蜎子，宓子之宓与伏同，笄子之笄与管同也。”谢墉对避讳说的非议，打破了千古之惑，所提出的“古音通假”说，也不完全为人所接受。

两氏并称说。胡元仪认为“避讳”说、“通假”说，都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于是他又提出新的看法，他说：“郇卿之为郇伯之后，以国为氏，无可疑矣。且郇卿赵人。古郇国在今山西猗氏县境，其地于战国正属赵，故为赵人。又称孙者，盖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也。王符《潜夫论·志姓氏》篇云：“王孙氏、公孙氏国自有之孙氏者，或王孙之班，或公孙之班也。是各国公孙之后，皆有孙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孙也，皆氏也。战国之末，宗法废绝，姓氏混一，故人有两姓并称者，实皆古之氏也。如陈完奔齐，《史记》称田完；陈恒见《论语》，《史记》作田常；陈仲子见孟子，郇卿书陈仲、田仲互见；田骈见郇卿书，吕览作陈骈。陈、田皆氏，故两称之。推之荆卿之称庆卿，亦是类耳。若以俗语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为言，尚未达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别传不称孙者，以别族在当时宜称孙，举近者言也。孙氏各国皆有，不明所出，后人宜称郇，以著所出，故郇卿书称孙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称之辞也。自太史公称荀卿，其后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复称孙也。”（《荀卿别传考异》，见《荀子集解》考证下）此说为多人所赞同，且言之有理。

“卿”的含义，又作何解呢？江瓌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艺文志》皆云荀卿名况，而不言其字，古人有名必有字，孟荀之字均不见于古籍，窃谓卿者即荀子之字也。古者名字相因，王引之作《春秋名字解诂》，搜录甚详，而证其相因之义。卿与况皆同部字，其义均为长为太，故名况字卿。古人有二字之字，亦有一字之字，荀况之字卿，亦犹刘邦之字季也。然则

有证乎？曰有。刘向叙曰：‘兰陵人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此为荀子字卿之确证。刘向不言：‘兰陵人喜名卿。’而曰：‘喜字卿。’则卿为荀子之字可知也。”（《读子卮言》）

综观上述资料可知，荀子名况，字卿，由于荀、孙相通，荀子又可称为孙卿。

由于荀、孙相通，看来，我们有必要对孙氏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考证，以便进一步认识荀子的家世。

查史料，孙氏有着不同的来源和血脉，是互不相关的三族：一族在楚，一族在齐，一族在卫。而荀、孙相通之“孙”氏，应该是在卫的一脉。《元和姓纂》在《孙氏》条下有这样的记述：“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楚令尹孙叔敖及荀况并为孙氏。”这一记载真切地告诉我们，荀子仍以周文王为远祖的王者血脉。我们不是唯血统论者，但是血脉对于人的气质和精神状态确实有着深刻的影响，那是无庸讳言的。

周文王喜“文”，他的文化精神感召了一代人士，也改造了一代人士。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食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无怪乎孔夫子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周文王的这种“文统”，必然会被他的后裔通过种种方式承继下来。由于史料的缺乏，现在已经不可能详细知晓荀子童年时的家境，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家族中人，他的父母辈人，都会以文王的道德风貌和道德精神教诲于他的。

既然说孙氏的一支在卫，那么，作为赵人的荀子又怎么可以